

哈尼夫·库雷西小说《亲密》中的婚恋叙事 及其文学伦理学反思

An Ethical Reflection on the Marriage Narrative in Hanif Kureishi's Novella, *Intimacy*

王 进 (Wang Jin)

内容摘要：作为第二代英国南亚裔作家的杰出代表，哈尼夫·库雷西始终关注当代英国南亚移民群体的家庭生活与情感世界。库雷西早期小说《亲密》，围绕男主人公杰伊的婚姻叙事，以中年男性的成长危机作为叙事焦点，聚焦叙述了本人的婚姻焦虑与伦理困惑。现阶段英美学界的库雷西批评将小说叙述者与作者本人的婚姻观念对号入座，造成道德评价谬误及其伦理越界行为。从文学伦理学批评视角来看，中年危机是作为婚恋叙事的伦理结，婚姻焦虑则是作为其伦理线，两者相互交织共同构成作为伦理事件的婚姻危机、作为伦理环境的成长叙事、以及作为伦理悖论的性别政治。

关键词： 哈尼夫·库雷西；《亲密》；婚恋叙事；伦理越界；文学伦理学批评

作者简介： 王进，文学博士，博士后，暨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欧美文学与西方文论研究。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米克·巴尔叙事诗学研究》（项目编号：14CWW002），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科类）特色创新项目（项目编号：2016WTSCX011），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暨南启明星计划）项目（项目编号：15JNQM02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Title: An Ethical Reflection on the Marriage Narrative in Hanif Kureishi's Novella, *Intimacy*

Abstract: As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one of second generation British-South Asian novelists, Hanif Kureishi has been consistently writing about their family lives and sensational world. His early novella, *Intimacy*, centers on the male protagonist Jay and his marriage narrative, focuses on his middle-age crisis as the narrative perspective, and focalizes his narrative of marriage anxieties and ethical dilemma. Currently, Kureishi criticism in English world relates the narrator Jay's experience of marriage with the author Kureishi, and leads to a fallacy of moral judgment and a transgression of ethical criticism. Examin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the middle age crisis in fact serves as the ethical knot of marriage

narrative, while the marriage anxiety as its ethical line, and they interweave with each other to constitute the ethical event of marriage crisis, the ethical environment of Bildung narratives, as well as the ethical paradox of gender politics.

Key Words: Hanif Kureishi; *Intimacy*; narrative of marriage and love; ethical transgression;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uthor: Wang Jin, PhD., is Associate Professor of 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at the Faculty of Foreign Studies,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China 510632). He is mainly engaged in European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as well as contemporary western literary theories (Email: twangjin88@jnu.edu.cn).

哈尼夫·库雷西是近年来活跃在英国文坛上的巴基斯坦裔小说家，2008年被英国《泰晤士报》评为“1945年以来五十位最伟大的英国作家之一”。库雷西对南亚移民的家庭生活与情感世界充满社会洞察力与文学同情心，评论界普遍视其为第二代英国南亚移民作家的杰出代表。迄今为止，库雷西小说《亲密》（1998年）被公认为是他本人最具阐释张力，也是最负争议的自传体小说。这部小说围绕中年男子杰伊的婚姻危机，聚焦叙述他在权衡抛妻弃儿、决意离家出走之夜的各种心理活动。自小说出版以来，始终备受诟病的不仅是种族主义的性别书写视角，而且是厌女主义的婚姻复仇伦理。不少批评家已经从爱情观念、婚姻关系、家庭责任、男性危机、厌女情节、同性恋问题等多个方面对小说男主人公杰伊的人物形象展开激烈的批判，其中不乏针对作者本人性别倾向的各种对号入座式的人身攻击。¹然而，现阶段的评论成果过度集中在对“厌女问题”的主题分析与性别批判，却没有充分关注到其婚恋叙事作为成长小说的文学伦理学内涵。因此，本文围绕库雷西小说《亲密》中的婚姻观念及其伦理建构，运用文学伦理学批评视角，重新解读男性中年危机的成长叙事，分析并探讨作为伦理事件的婚姻危机、作为伦理环境的成长叙事，以及作为伦理悖论的性别政治，并在此基础上揭示现阶段英美学界库雷西批评的道德评价谬误及其伦理越界行为。

1 库雷西小说《亲密》中的“厌女”主题饱受女性主义批评家的诟病，在当代英美文学界备受争议，理性分析的研究文献并不多见。相关文章主要参阅 Frederick Luis Aldama, “A review of Hanif Kureishi’s *Intimacy*,” *Callaloo*, 1999 (4); Connolly Cressida, “Married with Children,” *Observer*, 1999(May 10); David Sexton, “What do these authors have in common? They all hate women”[Review of *Intimacy*], *Evening Standard*, 1998 (May 14); Laura Cummings, “Charity Begins at Home”[Review of *Intimacy*], *Guardian*, 1998 (May 9); Kenneth C. Kaleta, *Hanif Kureishi: Postcolonial Storyteller*,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97; Bradley W Buchanan, *Hanif Kureishi*, London: Palgrave, 2007; 王进：“哈尼夫·库雷西小说《亲密》的婚姻观念与男性叙事”，《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2013(1)等。

一、作为伦理事件的婚姻危机

对于成年男性而言，成功的婚姻是成长的阶梯，夫妻关系不亚于最亲密的同路人；反之，失败的婚姻则是痛苦的泥潭，两者之间又莫过于最熟悉的陌路人。然而，维系良好的婚姻关系绝非易事，而是始终伴随着自我否定与自我重构的成长过程。婚姻关系如何维系，不仅涉及到夫妻双方认知发展的方方面面，而且呈现出两者成长叙事的不同性别维度。以男主人公杰伊的心理活动为叙事焦点，库雷西小说《亲密》刻画的是一位被困于婚姻围城当中的哈姆莱特形象，叙述的则是其本人纠结于“心动”还是“行动”的成长悖论。在酝酿离家的前夜，杰伊回忆与妻子苏珊、情人妮娜和朋友维克多的段段往事，在权衡的同时反而逐渐失去行动理由和成长动机。作为“思想的巨人”，杰伊满怀内心冲动，充满中年危机的男性焦虑与七年之痒的婚姻倦怠；作为“行动的矮人”，他缺乏行动能力，满怀面对婚姻的戒备心理和面对爱情的踌躇情绪。对婚姻危机及成因，杰伊无所适从，更无法言明，反而将其简单归结于“熟而生厌”的亲密关系，并且认为“伤害一个人，其实正是一种并非出于自愿的亲密表现”（库雷西2）。从文学伦理学批评来看，杰伊的婚姻关系是作为成长过程的伦理问题，其成长悖论表现为作为伦理事件的婚姻危机。正如聂珍钊先生指出，“在阅读文学作品的过程中，几乎所有伦理问题的产生往往都同伦理身份相关”（“文学伦理学批评”21）。对杰伊来说，其婚恋叙事呈现三个层面的伦理内容：作为伦理线的中年危机、作为伦理结的婚姻焦虑，以及作为伦理网的身份困惑。

中年危机既是杰伊婚恋叙事的伦理线，也是其成长悖论的心理动因。正如芮渝萍指出，作为成长叙事的重要内涵，“认知发展细分为社会认知、自我认知、道德认知、情感认知、智慧认知和环境认知六个方面”（芮渝萍34）。作为自由散漫、碌碌无为的中年业余作家，杰伊的认知发展主要纠结于社会认知的事业危机、自我认知的心理困惑，以及情感认知的角色迷惘。从事业危机来看，理应事业有成的杰伊却基本处于（半）失业状态，不得不依靠妻子苏珊作为出版商的丰厚收入维系家庭生活开支，甚至是其本人租用工作室的费用；从心理困惑来看，他也曾竭力的幻想在工作与家庭的不同空间当中发挥自己的绝对影响与主导作用，但是却不得不面对丰满理想遭遇骨感现实的尴尬境遇；从角色迷惘来看，他也曾积极担当作为丈夫和父亲的社会责任和家庭义务，但是无法回避自己日渐沦为弱势男性的中年危机，也就无法承受身份认同的心理危机。围绕认知发展的叙事视角，小说在家庭层面呈现的是“七年之痒”的婚姻现象，在社会层面反映出的是男性群体的中年危机，在叙事层面体现出的则是弱势男性的成长悖论（王进76）。杰伊的中年危机同样造成在认知与行动这两种范式之间的成长悖论。在认知发展方面，杰伊反思觉醒成长的徒劳，自我检讨“十年里我没有获得知识上的长进，也

没有从我对答案的渴求中挣脱出来”；在行动抉择方面，他备受心理焦虑的煎熬，自我诘问“我就像一直关在轮笼里的老鼠。我该怎么摆脱这一切？”（库雷西 49）中年危机的伦理主线始终贯穿杰伊的婚恋叙事，认知发展的成长悖论继续延伸到他本人的婚姻焦虑。

婚姻焦虑既是杰伊婚恋叙事的伦理结，也是其成长悖论的聚焦点。杰伊与妻子苏珊相识十年、厮守六年，却愈发感受到婚姻的围城效应与自我的成长困惑。杰伊与苏珊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成长模式：前者转向内心挣扎，消极的应对工作的失意和家庭的失势，后者则转向外部奋斗，积极的追求事业的成功与家庭的圆满；在此基础上，两者表现出二元对立的婚姻关系：在弱势的杰伊看来，苏珊成天颐指气使，只知发号施令；在强势的苏珊看来，杰伊终日无所事事，只会惟命是从。其结果，面对同样的中年危机问题，杰伊焦虑的是自己的男性属性与家庭地位，苏珊关注的则是自己的同事关系与事业发展。正如卢万尼指出，“库雷西关注的是在迷茫一代的男性和比他们更能干和更务实的女性同伴之间的各种关系”，在传统性别角色的反转关系当中“苏珊的各种能力反而变成对她进行妖魔化的原因”（Ruvani 111）。苏珊的精明能干不仅突显杰伊的中年危机问题，而且加剧双方的婚内紧张关系，并且造成后者对家庭生活的男性焦虑心理。按照杰伊的描述，他的婚姻焦虑具有三个层次的具体形式。一是失语问题：“每回面对她，我心里早就变得结结巴巴了”；二是失态感受：“我觉得我的身子在她的注视下开始萎缩”；三是失魂心理：“我从来就不知道该做什么好，很快我就会感觉自己好像被她推挤到墙上，身上像是挨了一阵乱棍”（库雷西 7）。即使是在决意离家的当天，杰伊仍然充满对苏珊的畏惧，以及对婚姻关系的焦虑，以至于“整个下午，这一整天，都在发抖”（库雷西 2）。以中年危机为伦理线，杰伊的婚姻焦虑辐射影响到伦理身份的认同困惑。

身份困惑既是杰伊婚恋叙事的伦理网，也是其成长悖论的问题域。婚姻危机不仅是作为家庭破裂的情感事件，而且也是作为身份重构的伦理事件。正如杰伊本人坦言，“我都在考虑离家出走这件事，全方位地考虑”（库雷西 3）。他的离家行为不仅涉及背弃家庭亲情的伦理成本，而且包括拥抱未知生活的道德风险。一方面，让杰伊犹豫不决的是要解除与妻子苏珊的“亲密”关系，让他惧怕不已的则是“我们将因为共同拥有一段历史而成为危险的熟人”（库雷西 2）；另一方面，让杰伊迷惑不止的是重构多种可能的“亲密”关系，他可以选择与情人妮娜的异性恋关系，或者是与维克多的同性恋关系，但是仍然让他苦恼不已的则是“该怎么和他们保持适当的距离呢？”（库雷西 93）杰伊的婚姻危机在本质上源自他对身份角色的认同困惑，并且直接影响到其对亲密关系的伦理判断。这种身份重构的伦理选择呈现出的乃是“由人性和兽性因子组合而成的斯芬克斯因子通过理性意志、自由意志和非理性意志之间的伦理冲突”（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49）。具体而言，

理性意志压制杰伊对离家行为的心理冲动，自由意志释放他对身份重构的非分之想，非理性意志则纵容他对伦理禁忌的不良欲望。在伦理选择的具体过程，直接面临的是人性与兽性因子的伦理冲突，在伦理冲突的解决过程，重新应对的则是理性与自由意志的伦理选择。凡此种种，最终均指向作为伦理环境的成长叙事。

二、作为伦理环境的成长叙事

对于理性的夫妻关系而言，婚姻生活主要遵循的是存在主义的适度原则，因此并不存在任何绝对化的敌对关系，或是孰是孰非的道德问题，而是表现为一种相对化的磨合关系，以及家庭矛盾的伦理问题。聚焦作为伦理事件的婚姻危机，库雷西小说《亲密》大致呈现出杰伊婚恋叙事从中年危机、婚姻焦虑到身份困惑等三方面的伦理内容。因此，合理评价杰伊弃家而逃的伦理悖论，并不能简单地停留在家庭责任和义务的道德批判，而是应该延伸考察作为伦理现场的成长过程。针对伦理问题的评价方法，文学伦理学批评强调的是“进入文学的伦理环境或伦理语境中，站在当时的伦理立场上解读和阐释文学作品，寻找文学产生的客观伦理原因并解释其何以成立，分析作品中导致社会事件和影响人物命运的伦理因素，用伦理的观点对事件、人物、文学问题等给以解释，并从历史的角度作出道德评价”（“文学伦理学批评”14）。婚姻危机的伦理问题，起源于作为中年危机的成长悖论，却又回溯到作为伦理环境的成长叙事。正如杰伊本人感悟：“失败的婚姻可不是一个能被密封起来的小隔间，它会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就像个漏了眼的油罐头”（库雷西 129）。从自我塑型的成长视角来看，“自我教育的社会环境大致包括职业与娱乐、人际关系（婚姻、父母、友谊）、社会责任与义务”（孙胜忠 85）。杰伊的婚姻危机既是自我教育的伦理事件，也是作为成长悖论的伦理现场。具体而言，作为伦理环境的成长叙事则大致包括家庭生活、社会关系与自我意识等三个层面。

在家庭生活层面，杰伊成长叙事的伦理环境直接表现为什么与其他家庭成员的亲密与疏离问题。就父母关系而言，童年的杰伊已经过早的理解父母之间仅存忠诚义务、毫无亲密关系的婚姻危机，并且悟到：“婚姻中几乎没有快乐，它只包含着无尽的忍耐，就像做一个你所痛恨的工作”（库雷西 57）。就夫妻关系来看，杰伊与苏珊的不同成长经历造就“女强男弱”的“家庭伦理剧”：苏珊出身伦敦上流社会，工作生活有条不紊，为人处世深思熟虑；与此相反，杰伊来自伦敦郊区的中下阶层家庭，据说是长期浸淫“贫穷与虚妄的自负奇异地交织在一起”的社会环境，并且已经习惯性的精于矫饰与掩藏之能事，让他始终有能力自我安慰“我似乎已经习惯了被她推搡、受她奴役的日子，这是因为我没有搞清楚自己到底要什么，因为我习惯了逆来顺受”（库雷西 30）。从父子关系来看，杰伊作为父亲的成长叙事也是充满着自我

与他者的伦理冲突：孩子们的健康成长是夫妻关系的共同话题和家庭生活的感情基础，杰伊的父爱作为婚姻危机的自我救赎，让他总是寄托“这个世界因为他们的吵闹而重新变得生机勃勃”；与此同时，他将自己在夫妻关系中的弱者情感延伸到同样是处于弱势地位的孩子身上，其父爱始终作为与母爱相对的他者视角，以至于他狡辩“我和我的儿子需要的是同一种东西：更多的人生”（库雷西 11, 15）。回到家庭关系的伦理现场，杰伊的自我教育更多的是呈现出男性权力的危机意识与焦虑问题。

在社会关系层面，杰伊作为不太成功的业余作家，其社交范围相对局限，因此他的成长叙事当中相对集中的出现了三种不同的引路人角色。其一、作为中立者形象的异性恋情人妮娜。与妻子苏姗给他造成的焦虑心态相比，妮娜在杰伊眼中“是一个在城市里四处游荡的自由自在的姑娘”，更加难能可贵的是她始终保持适度的自由与适当的距离，给他带来的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亲密欲望（库雷西 71, 82）；其二、作为正人君子形象的大学同学阿西夫。与妻子苏姗给他造成的压抑情绪相似，阿西夫在杰伊眼中是“正直的、讲原则的人”，并且“拒绝一切玩世不恭的事”，更加难以忍受的是其始终对自己的信仰自鸣得意、对别人的活法指责排斥，因此给他带来的是与家里一样的“混杂着沮丧与消沉的氛围”（库雷西 39-40）；其三、作为负面人物形象的同病相怜者，其中包括离婚独居的同性恋朋友维克多、离异又复婚的肥胖中年会计、恐婚的同性恋朋友伊安。从弗洛伊德的性格结构理论来看，此三者似乎构成杰伊人格的不同境界：作为本我的伊安代表着他任性追求伦敦单身汉生活的内心世界及其快乐伦理；作为超我的会计朋友体现为他决意压抑自我、安于现状的道德世界及其至善伦理；作为超我的维克多意味着他逃避家庭责任、短暂恢复自由的权宜作派及其现实伦理。回溯社会关系的伦理现场，杰伊的自我教育展现出的是在不同引路人、同路人、以及异路人形象之间的价值观念与交流过程。

在自我意识层面上，杰伊的成长叙事则又具体表现为在心动与行动之间的伦理选择，在觉醒与顿悟之间的伦理困境，以及在成长与反成长之间的伦理冲突。就伦理选择而言，杰伊始终纠结的是自己离家出走的道德风险，以及在自由与义务之间的伦理考量。他强调倾听内心对单身自由的呼唤，虚妄放言“摧毁这一切，这样才能突围，才能逃出去”，旋即却又提出对家庭责任的重视，自我反省“你可以拿自己的人生做实验；不过，也许你不应该拿别人的人生来当实验品”（库雷西 49）；就伦理困境来说，杰伊始终困扰的是在“离开”与“留下”之间的伦理两难。是选择离开，直面这遥遥无期的煎熬，还是选择留下，默默忍受这暴桀的命运，这不仅关乎杰伊对家庭地位的顿悟，而且涉及他对男人权力的觉醒。然而，颇具荒诞意味的是：为了证明自己的男性气概、恢复应有的家庭地位，他只能考虑选择以离家出走这种最没有男子气概可言的弱者行为，即使是他本人也非常清楚“一个拥有意志、

勇气和责任心的男人完全应该有不同的表现”(库雷西 44)。就伦理冲突来看,杰伊同时呈现的是成长与反成长的悖论问题。他对现在的婚姻生活倍感煎熬,渴望突破现状、自由成长,认为“家庭似乎不过是一台让自由的个体饱受压抑和扭曲的机器”(库雷西 72);但是,杰伊对将来的成长道路却又迷茫无助,他始终未能跳出伦理冲突的两难困境,不但失去了心动的方向,而且失去了行动的理由,借用他的原话来说,“我必须做点什么。可是该做什么呢?最关键的是,为什么要做呢?”(库雷西 48)因此,作为伦理环境的成长叙事,实际上也是作为杰伊成长悖论的伦理现场。

三、作为伦理越界的性别政治

从文学伦理学批评视角来看,杰伊的婚姻危机是作为成长叙事的伦理困境,呈现出其本人认知发展的成长悖论,他的成长叙事则是作为婚姻危机的道德环境,表现为其本人情感发展的伦理悖论。应该说,主体认知的成长悖论作为伦理主线贯穿杰伊的婚恋叙事,道德情感的伦理悖论作为叙事主线延伸到对“亲密关系”的阅读与接受问题。围绕“亲密关系”的男性叙事空间,阿密特瓦·库玛认为“库雷西对于性和欲望的描述不是怀旧主义的,而是应对充满政治意味的当下问题”,即在后现代文化语境的爱情与婚姻观念“不再是在放荡和忠诚之间的简单选择,而是我们的选择总是受到其对立面的威胁,甚至于被牵引到相反的境地”(Amitava 159)。作为当下问题的婚恋叙事,显然已经超越了善恶二元对立的道德判断,更多的是指向多元立场共存的伦理评价。藉于此,卢万尼发现“库雷西总是刻意地制造距离感,使得对于《亲密》的阅读愈加模棱两可”:一方面,杰伊是作为“传统恶棍形象(自私、残酷和不成熟)”,充分展现“男性自私、自由欲望和逃避责任的‘传统形式’”;另一方面,他又重新包装成为“后现代文化英雄(勇敢的离家出走,无视资产阶级道德观念)”,浑身洋溢着“一种‘青春躁动’和‘新型’男性气质”(Ruvani 110,112)。阿密特瓦从当下文化语境重新界定作为道德问题的“亲密关系”,卢万尼则从当下阅读立场重新揭示作为道德现象的杰伊形象。两位评论家聚焦讨论杰伊婚姻危机的道德动因,在为其男性叙事做无罪辩护的同时反而错将其视为库雷西本人的道德立场,因此并没有关注到这种道德评判本身的不同性别立场。

针对“亲密关系”的女性叙事空间,女性主义批评家们转向到评价苏珊作为妻子的强悍形象,以及杰伊对苏珊的弱者地位。苏珊及其存在消解的是传统女性所扮演的贤妻良母刻板形象,杰伊的困境则彻底改写了传统男性在家庭生活中的男权和父权强势文化,在两者之间的反转关系挑战的则是读者群体对传统婚姻与夫妻关系的各种权力预期与道德预判。然而,从女性主义视角对杰伊的道德审判,同样延伸到对于库雷西本人的不同道德评价:一方面,吉尔伯特·穆勒等人赞许库雷西的性别书写,认为“《亲密》可以在

某种程度上被视为“后女权主义”的案列，明显不同于以往批判女权主义的批评家及作品，因为它并没有将女性运动的成功及其效果归结到当代男性”（Moore-Gilbert 179）；另一方面，塞克斯顿、阿达玛等人则又猛烈批判库雷西的性别立场，强调“亲密关系真实记录的是世纪末他者的政治无意识”，认为杰伊及其创造者库雷西本人“在本质上都是憎恨女性的”（Aldama 1097-1100）。在对杰伊夫妻关系的阅读与阐释过程，他的婚姻危机往往被直接归结为男性权力对新女性形象的道德立场，他的成长悖论被简单的解读成在善性与恶意之间的道德行为，其伦理困境则被过度的阐释为库雷西本人的写作意图。因此，在女性形象的再现问题上，现阶段的库雷西批评主要聚焦“强女弱男”的性别形象及其道德解读，始终纠结于“赞女”与“厌女”的不同阐释立场，由此而生的这种道德悖论逐渐演变成为对于作家本人道德问题的猜想与质疑。

小说《亲密》充满各种可能的开放型结尾，则又突出呈现“亲密关系”的可然叙事空间。杰伊经过全面的利弊权衡和伦理考量，但是对自己的伦理选择却仍然是语焉不详，并将其成长叙事的伦理悖论继续推向道德批判的性别政治及其叙事迷宫。正如他本人在小说结尾透露：在解决婚姻危机的成长悖论之后，“我们在一起漫步，沉浸自己的思想里。我忘记了我们身在何处，也忘记了这是几时”；在消除道德情感的伦理困境的同时，“突然之间我感觉万事万物都如此妥帖，快乐与满足无以复加”（库雷西 153）。然而，杰伊始终没有对自己话语中“我们”作出任何形式的身份界定，由此产生出的则是多种可能性的伦理立场与阐释空间。具体而言，如果共同散步的人是苏姗，那就意味着与结发妻子破镜重圆的伦理选择；如果是妮娜，那就是与婚外异性情人不伦之实的道德问题；如果是维克多，那么就是与同性恋情人觉醒意识的性取向问题；如果是他自己，那么极有可能就是其本人沦为自恋狂的人格分裂症状。针对“亲密关系”的各种猜想，虽然缘起于小说文本的可然叙事，却总是指向作家主体的叙事意图。实际上，库雷西对这种削足适履的意图阐释是极度排斥，对任何对号入座的道德批判也是不厌其烦：一方面，他从文学的阐释立场提倡理性分析，认为“某些评论家已经陷入到对《亲密》的狂怒喧闹”；另一方面，他从文学的叙事视角强调文本解读，挑明“这本书是一个文本，而不是我的生活，我不是文本”（Yousaf 25）。然而，让库雷西始料不及的是：原本理应属于小说《亲密》的阐释争议，已经衍变成为针对其本人的道德批判乃至人身攻击。

针对这种道德评价谬误的库雷西现象，苏西·托马斯强调“关于《亲密》的大部分批评阐释是政治性的，并且/或者是传记式的，而并非美学意义上的”（Susie 144）。对于杰伊形象的道德批判，以及对于库雷西的人身攻击，似乎也已经陷入到了一种伦理两难的尴尬现状，不但没有从文学叙事重新建构文学人物的道德关系与伦理环境，反而愈加衍变成为不同身份立场的性别政

治与阐释话语。究其原因，从文学人物到作者主体的错位阐释，实际上是对不同伦理语境的越界行为，“将现实的伦理评价带入到了虚构的文本中，脱离了小说文本中所体现的伦理语境”（杜明业 65）。应该说，在文学的虚构世界产生的一系列道德问题，其阐释争议理应回归到其文本世界的叙事空间，而不应该超越虚构与现实的阐释边界进而延伸并介入到作者的生活世界。就小说《亲密》引发的阐释争议而言，我们不应该只是简单的对作者本人作出具体的道德评价，而是必须从文学伦理学批评视角重新建构小说人物的道德关系与小说世界的伦理秩序。因此，小说人物杰伊婚恋叙事中的多重“亲密关系”，实际上是作为小说世界伦理秩序的焦点问题，其文学伦理学批评必须回溯作为伦理环境的成长叙事，进而考察作为伦理事件的婚姻危机，在此基础上理性的分析作为小说人物成长悖论的反/伦理问题，合理的评价作为小说世界伦理悖论的反/成长问题。惟其如此，才能摆脱长期以来困扰库雷西本人及其研究者的道德批判和阐释争议，正视并纠正文学批评与阐释的伦理越界行为及其道德评价谬误，从文学世界的伦理秩序分析文学人物的道德问题，为现实世界的伦理秩序提供文学叙事的道德戒喻。

Works Cited

- Aldama, Frederick Luis. “A review of Hanif Kureishi’s *Intimacy*.” *Callaloo* 4 (1999):1097-1100.
- Amitava, Kumar. *Bombay London New York*.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 Cressida, Connolly. “Married with Children.” *Observer* (May 1999): 18.
- Cummings, Laura. “Charity Begins at Home” [Review of *Intimacy*]. *Guardian* (May 9, 1998): 9.
- 杜明业：“《别让我走》的文学伦理学解读”，《外国文学研究》3 (2014): 60-67。
- [Du, Mingye. “An Ethical Literary Analysis of Never Let Me Go.”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3 (2014):60-67.]
- 哈尼夫·库雷西：《亲密》，王莹莹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7年。
- [Hanif Kureishi. *Intimacy*. Trans. Wang Yingying. Shanghai: Shanghai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2008]
-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外国文学研究》1 (2010) : 12-22。
- [Nie, Zhenzha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Its Fundaments and Terms.”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1 (2010):12-22.]
- ：“《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 [—. *An Introduction to Literary Ethical Criticism*. Beijing: Beijing U P, 2014.]
- Moore-Gilbert, Bart. Hanif Kureishi. Manchester: Manchester U P, 2001.
- Proctor, Minna. “Buddha Leaves Suburbia.” *The Nation* (April 19, 1999):38.
- Ranasinha, Ruvani. *Writers and Their Works: Hanif Kureishi*. Plymouth: Northcote House, 2002.
- 芮渝萍、范谊：“认知发展：成长小说的叙事动力”，《外国文学研究》6 (2007): 29-36。
- [Rui,Yuping, FanYi. “Cognitive Development as Narrative Impetus in Initiation Stories.” *Foreign Lit-*

Literature Studies 6 (2007): 29-36.]

Sexton, David. “What do these authors have in common? They all hate women”[Review of Intimacy].

Evening Standard, 1998 (May 14):1.

孙胜忠：“论成长小说中的‘Bildung’”，《外国语》4 (2010): 81-87.

[Sun, Shengzhong. “On ‘Bildung’ in Bildungsroman.” *Journal of Foreign Languages* 4(2010):81-87.]

Susie, Thomas, eds. *Hanif Kureishi*. Hampshire: Palgrave, 2005.

Yousaf , Nahem. *Hanif Kureishi’s The Buddha of Suburbia*. New York: Continuum, 2002.

王进：哈尼夫·库雷西小说《亲密》的婚姻观念与男性叙事，《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2013(1): 76-80。

[Wang, Jin. “The Conception of Marriage and Male Narratives in Hanif Kureishi’s Novel Intimacy.”

Journal of Tianjin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1(2013): 76-80.]

责任编辑：杨革新